

美国—以色列同盟中的 联盟管束问题

——以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为例

张 帆

内容提要 在2023年遭受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后,以色列迅速在加沙地带展开旨在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其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人道主义危机日趋加重,对大选年的美国国内政局及民主党的竞选前景产生影响,并冲击拜登政府极力推行的美国“新中东战略”。着眼于缓解国内舆论压力以及降低对美国“新中东战略”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于2024年2月开始通过美以各种制度性磋商机制,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进行劝阻、警告,以及在武器供给和外交领域采取的惩罚举措。但管束举措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效果,以色列仍按部就班地实施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是一次失败的联盟管束尝试,管束失败主要源于管束不力,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管束意志不足,因为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以

* 张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7)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最优先事项的推进。2025年1月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总统并未将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列为美国应对加沙危机的政策选项,但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涉及加沙战后治理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2.0仍有可能将“联盟管束”应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同盟理论 联盟管束 加沙军事行动 美国—以色列关系 美国中东战略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发动针对以色列的突袭,杀害1200名平民,并劫持235名平民作为人质;^①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展开以彻底剿灭哈马斯、全面占领加沙为目标的军事行动。针对以色列—哈马斯在加沙爆发的战争,拜登政府的应对政策主要包括: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和消灭哈马斯的战争目标;确保人质得以释放;防止战争扩大、升级;有效应对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平民,以及着手战后重建。^②自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爆发至2025年1月拜登总统卸任,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始终是美国政府应对以哈加沙战争最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但随着加沙战事的加剧,平民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人道主义危机日趋加深、加沙战争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不断加剧。在国内舆论压力下,拜登政府在2024年春季试图管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以色列在加沙仍一意孤行,按部就班地推行其旨在全歼哈马斯、全面占领加沙的军事行动,2024年下半年,拜登政府基本放弃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努力。2025年1月,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政府则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采取支持和放任态度,美以关系中呈现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管束缺失的局面。

^① Jim Zanotti and Jeremy M. Sharp, *Israel and Hamas Conflict in Brief: Overview, U. S. Policy,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4, 2024, p. 1.

^② Brian Katul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at A Time of War: An Assessment of US Policy Six Months into the Israel-Hamas War*,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Report, April 2024, p. 1.

本文着重考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动因、举措及管束失败的原因。

联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主要是联盟内部通过讨价还价进行的博弈,以解决盟国之间因利益而产生的分歧的过程;^①联盟管束(alliance restraint)则是一种特定而重要的联盟管理问题或挑战,是指联盟中的一国通过实际或拟议中的外交活动,对联盟中的另一国施加影响,使其放弃计划实施的军事政策或改变已实施的军事政策(包括军事干预、战争、军售、核武扩散以及联盟组建等)。^②国内外学界已就联盟管理中的联盟管束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成果涉及管束动因、举措和有效性等。^③联盟体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是美国的实力“倍增器”,在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人士更加强调联盟体系对于美国赢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并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经验,强调联盟内部管理,包括联盟管束,对于提升联盟“倍增器”作用的重要意义,且就如何有效管束盟国提出政策建议。^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本文考察的议题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中的联盟管理问题,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管束问题,历来是联盟管束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或案例分析对象,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美国管束以色列的动因、举措和有效性的分析,对于本文的研究议题具有较大启迪意义。但是,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尝试,具有独特的时代和地缘政治背景,因此,考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尤其是探究管束失败的原因,有助于增进对联盟管束的理解,尤其是对美以“特殊关系”中美国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理解。

本文以国内外学界既有联盟管束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拜登政府 2024

①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

②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

③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p. 1-414;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92;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106页;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74—94页。

④ Richard Haass, “The Trouble with Allies: America Needs a Playbook for Difficult Friends,” *Foreign Affairs*, Vol.103, No.5, September/October 2024, pp. 89-105.

年春季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动因和举措、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失败的原因,以及结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应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政策后联盟管束的有限性和不足等议题进行探究。

一、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的动因

在以色列开启加沙军事行动后,拜登政府立即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强调以军事援助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和“消除源自哈马斯的威胁”,并增派巡弋中东的航母战斗群,为以色列助威。^① 拜登总统亲自造访以色列,成为在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时出访该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在加沙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持无条件支持态度,主要以“对外军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和“直接商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s, DCS)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并通过“盟国战争储备—以色列”(War Reserve Stocks for Allies-Israel, WRSA-I)向以色列交付具体的物件。^② 但拜登政府从2024年2月开始着手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施以管束。

联盟管理源于盟国间基于利益的分歧或争议,联盟管束的动因只是某种更为具体化的分歧或冲突,即联盟内部某国的军事政策威胁、危害联盟内部另一国的利益或政策目标,导致后者试图管束前者的军事政策。此外,联盟内部某国的军事政策有时使盟国面临国内舆论压力并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促使后者着手管束前者。^③ 有关美国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研究成果强调,美国之所以着手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主要在于以色列某一具体军事行动与美国特定时期的对外战略目标相冲突,威胁、损害美国

^①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pdated May 28, 2025, p. 3.; Jim Zanotti and Jeremy M. Sharp, *Israel and Hamas Conflict in Brief: Overview, U. S. Policy,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pp. 8-11.

^② Jeremy M. Sharp, *Israel and Hamas Conflict in Brief: Overview, U. S. Policy,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pp. 7-8.

^③ Christopher F. Gelpi, “Alliances as Instruments of Intra-Allied Control or Restraint,” in Helga Haftendorn,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7-139.

地区甚至全球战略目标。^① 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拜登政府的管束动因,一是2024年美国大选及国内舆论压力;二是加沙军事行动升级对美国中东战略的负面影响。

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伊始,拜登政府及美国国内民众较为一致地支持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展和升级,加沙战事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截至2024年4月,已有3万多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仅战端开启后最初几周死于以色列空袭的巴勒斯坦平民数量就多于自以色列2005年撤离加沙后历次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死亡的加沙平民总人数;^②以军的空袭和地面军事行动极大地破坏水电供应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加沙战事的复杂性迫使以色列有意或无意地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及时、充分地运送、分发到急需救助的巴勒斯坦平民手中,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于战事开始4个月后就发出加沙存在饥荒风险的警告,战事进入快半年后,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证实,加沙北部地区已于2024年4月爆发饥荒。^③ 从2024年初开始,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呈规模不断扩大、打击力度不断强化之势,由此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人道主义危机日趋加重,此情形对大选年的美国国内政局及民主党胜选前景产生影响,同时冲击了拜登政府极力推行的美国“新中东战略”。着眼于缓解国内舆论压力以及降低对美国“新中东战略”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于2024年2月开始着手管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一) 国内层面的动因

相对于以色列既往军事行动在美国引发的反应,2023年10月7日后的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在美国引发更大程度的争议和分裂:更多美国国会

^① Warren Bass, *A Surprise Out of Zion? Case Studies in Israel's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Alert the United States to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Strikes, from Suez to the Syrian Nuclear Reactor*,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5, pp. 71-72; Daniel Sobelman, "Restraining an Ally: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s Nuclear Program, 2011-2112," pp. 15-16, 36.

^② Brian Katul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at A Time of War: An Assessment of US Policy Six Months into the Israel-Hamas War*, p. 5.

^③ Ibid., p. 6.

议员质疑以色列军事行动合法性,要求拜登政府依据美国国内立法对军援设置条件,而更多的美国民众尤其是美国青年,持反以亲巴勒斯坦立场,要求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美国国会历来是美国亲以势力大本营。2023年10月7日后,国会迅速通过补充拨款法案,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表现出强有力的亲以势头。但在以色列日益强化加沙军事行动并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质疑和反对以军暴行,敦促拜登政府按既有法案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并试图以新的立法为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提供法律武器。2023年11月,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发表声明,在承认以色列合法自卫权的同时,批评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没有平衡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敦促以色列实施某种更为慎重和适当的反恐军事行动;^①12月,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交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根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相关条款规定,向国会提交有关以色列人权实践的信息;^②2024年1月,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就参议院补充拨款议案提出修正案,要求在向安全援助接受国交付美国防务物件前,总统须获得保证,援助接受国将全力配合美国在防务物件使用地区所从事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③

美国国会总体上仍保持强烈亲以立场并加大军援以色列力度,但批评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声音日渐增多,国会内部就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分歧日渐加大,对立和分裂态势随着加沙战事的升级而日趋明显,这种对立和分裂也在美国国内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生态中得以体现。有关加沙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报道严重影响长期存在于美国民众中的亲以态度,反对以色列加沙暴行、要求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抗议活动迅速在全国蔓延。2024年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民

^① Charles W. Dunne, “Gaza, Biden, and an American Intifada,”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 C., Mar 27, 2024,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gaza-biden-and-an-american-intifada/>, 2025-08-30.

^②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4.

^③ Ibid.

众——尤其是美国青年——对以色列的支持显著降低，在18—34岁的年轻人群体中，对以色列持好感的占比从2023年的64%下降到38%，在35—54岁的中年人群体中，此类占比从66%下降到55%，其他民调机构在2—3月的民意测验结果也显示类似倾向。^①

上述倾向预示，以色列加沙战事将有可能对2024年美国大选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2024年3月2日的民主党密歇根州初选中得以显现。在这个“摇摆州”的初选中，约10万选民选择“不表态”(uncommitted)而非选择拜登。主要由美国青年发起的“不表态”运动很快蔓延到其他州，在明尼苏达州，约20%的选民成为“不表态”选民。“不表态”运动的兴起源于青年选民对诸多政策的不满，但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放任、纵容无疑是促发“不表态”运动的重要原因。^②

鉴于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中反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及拜登政府无条件支持此类行动的声音日益高涨，更由于拜登政府放任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促发民主党初选中的“不表态”抗议运动，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并着眼于为民主党赢取大选，拜登政府着手改变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放任政策，试图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施以管束，以减轻加沙平民伤亡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借此改善拜登总统及民主党在大选年的国内政治—社会生态。

(二) 地区战略层面的动因

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以歼灭哈马斯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后，拜登政府应对以色列—哈马斯加沙战争的政策主要包括五个要素：以支持以色列自卫权为名，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强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后者“急需的军事援助”；确保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获释；防止加沙战事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保护平民安全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着手计划加沙战后重建。这五个政策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拜登政府积极推

^① Charles W. Dunne, "Gaza, Biden, and an American Intifada."

^② Ibid.

行的美国“新中东战略”。^①

所谓“新中东战略”就是以奥巴马政府开启的中东战略收缩为基础,在恪守美军不卷入中东大规模地面军事冲突、主要依赖中东盟伴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将美国处理中东事务的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具体路径包括:通过“去冲突、去风险”(de-conflict, de-risk)外交化解地区危机,通过经济援助缓解中东源于战乱和气候变化等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通过地区整合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美国中东战略从“安全第一”到“民生第一”的转型。^②“新中东战略”成为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重要指南,上述政策均折射“新中东战略”的影子:以色列— Hamas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表示全力支持以色列,迅速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体现以地区盟友作为应对地区安全问题主角、美国仅扮演支持角色的战略思维;拜登政府强调防止加沙战事升级、外溢,这主要源于“新中东战略”强调的“去冲突、去风险”外交,以及“新中东战略”强调的战略收缩和地区用兵原则,即拒不卷入中东大规模地面军事冲突。防止加沙战事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防止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将美国拖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拜登政府应对以色列— Hamas加沙战争时不断提及的确保人质获释、平民安全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体现了美国“新中东战略”的核心,即对个人生命安全和民生福利的关注;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政策还强调加沙战后重建,而所谓的“加沙战后重建”则主要以新中东战略倡导的“地区整合”为指导。

在拜登政府全力支持下,以军不断消灭 Hamas 有生力量,朝着全歼 Hamas 的目标逐步迈进,但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很快对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其他政策要素及其背后的“新中东战略”产生负面影响;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势重创 Hamas 武装,但同时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以色

^① Brian Katul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at A Time of War: An Assessment of US Policy Six Months into the Israel-Hamas War*, p. 1.

^②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East Partners to Address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White House, July 1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6/fact-sheet-the-united-states-strengthens-cooperation-with-middle-east-partners-to-address-21st-century-challenges/>, 2025-08-30.

列的军事优势及以军对哈马斯领导层的“定点斩首”战术迫使哈马斯更大程度地依赖其扣押的人质作为与以色列讨价还价的筹码,加重了“确保人质释放”的难度,以“个人生命安全和民生福利”为核心的“新中东战略”遭遇严重挑战;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迅速引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政权对哈马斯的支持,以色列毫不示弱地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开战,加沙冲突面临外溢、升级为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直接威胁拜登政府“防止加沙战事升级为更大规模地区冲突”的政策要素,使强调“去冲突、去风险”及“避免美军卷入中东大规模地面冲突”的“新中东战略”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消灭哈马斯、全面占领加沙和弃绝巴勒斯坦建国为目标,这与拜登政府着手计划的加沙重建严重冲突。拜登政府计划的加沙重建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强调在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前提下,由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共同参与。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使巴勒斯坦建国前景更为暗淡,沙特由此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建交谈判,而拜登政府在加沙战争前倡导的、旨在促进中东经济、技术发展的四国(美国、印度、阿联酋和以色列)小多边合作,以及“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建设也因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陷于停顿,以“地区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中东战略”

二、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的举措

从2024年2月开始,拜登政府试图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进行管束,以减少平民伤亡、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既有联盟管束理论强调,一国对其盟国军事政策的管束主要包括“言辞”和“具体政策”实践两大类:前者指通过劝说、警告,敦促盟友放弃或改变既有军事政策,后者则指通过惩罚或奖励举措,促使盟国放弃或改变军事政策,也指以新的政策方案取代盟国军事政策。^① 拜登政府的管束举措主要出台于2024年4—6月。“言辞”举措主要指拜登政府通过美以各种制度性磋商机制,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进行劝阻、警告,以及对以色列实施某些军事行动的计划进行公开劝阻;

^①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

“具体政策”实践管束举措主要指拜登政府为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而在武器供给和外交领域采取的惩罚举措。从2024年7月开始直至拜登政府卸任,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逐渐势弱,尽管拜登政府在2024年下半年仍不时在“言辞”上劝阻、警告以色列。

(一) 拜登政府的言辞类管束举措

拜登政府主要通过总统本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拜登总统及国家安全界高官与媒体的例行互动,以及拜登总统的公开讲话等形式,就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提出质疑或警告,以期引起以方关注并采取克制措施,主要事例包括:

在2024年3月7日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拜登总统以相当篇幅谈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强调指出,“就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人数而言,这场战争超过以往历次加沙战争的总和”,并提醒以色列领导层,“人道主义援助不能是某种次要考量或讨价还价的筹码”。^① 2024年4月1日,以军空袭造成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 WCK)的七名救援人员死亡,此事件进一步激发美国国内外舆论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拜登总统强烈呼吁以色列增加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强化救员人员保护。2024年4月4日,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拜登总统警告,“美国的加沙政策取决于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评估,即以色列是否立刻着手解决平民伤害、人道主义灾难以及援助人员安全”。^② 拜登总统暗含的威胁是,如果以色列不就人道主义救援和平民安全问题采取措施,美国将放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并在联合国降低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

2024年春,以色列着手对拉法(Rafah)发起地面进攻,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反对以色列即将发起的对拉法的地面进攻,并提出警告,如果以色列在

^① Molly Pasquarella, “Biden’s State of the Union Remarks on Gaza,”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 C., Mar. 8, 2024,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bidens-state-of-the-union-remarks-on-gaza/>, 2025-08-30.

^② Jeremy Pressman, “Mind the Gap: U. S. Preferences and Israel’s War Conduct,” *Quincy Brief*, No.66,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November 2024, p. 14.

没有明确的平民保护计划的情况下实施进攻,他们将就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附加条件。拜登政府力图劝阻以色列在缺失平民安全保障计划的情况下发起进攻。2024年5月8日,以色列兵临拉法之际,拜登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中强调,“我已清楚地(向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战时内阁表示,如果他们攻入这些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他们将不会得到我们(在武器弹药方面提供)的支持”。^①几天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警告,“如果以色列在拉法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将不会向以色列提供有助于此类行动的武器系统”。^②5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要求以色列“必须为确保平民安全和福利救济做出更多努力。”^③2024年10月13日,在美国国务院给以色列外交部的信函中,以较为严厉的口吻指出,“自此开始的30天内,(以色列)必须就加沙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促使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大量增加。”“(如以方)不能显示其持续致力于实施和维持这些举措”,在现有法律下,这将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④

(二) 拜登政府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管束举措

在言辞管束未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产生任何制约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诉诸某些集中于武器供给和外交领域的具体管束举措,试图以此约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以减少平民伤亡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就武器供给而言,拜登政府采取举措,强化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援助的问责制度,并暂停某些用于空袭的炸弹的供给。2024年2月,拜登总统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20》(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20),要求在转让任何美国防务物件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必须获得物件接受国此类“可信且可靠的”书面保证:它将按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其他国际法的规定使用这些物件;备忘录还要求,在这些物件得以使用的任何地区,“接受国将

①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7.

② Jeremy Pressman, “Mind the Gap: U. S. Preferences and Israel’s War Conduct,” p. 14.

③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7.

④ *Ibid.*, p. 9.

促进而非恣意拒绝、限制或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运输或交付)”。^① 备忘录要求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为国会做此类评估:在备忘录发布后,美国防务物件的使用是否违反国际法。2024年3月,作为美国防务物件接受国,以色列根据此备忘录向美国提供书面保证。^② 按《国家安全备忘录—20》第二条,拜登政府于2024年5月向国会提交报告称,鉴于以色列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制造的防务物件,有理由认为,2024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国家安全备忘录—20》所涉及的防务物件时存在此类情况:违反备忘录强调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及公认的减轻平民伤害的最为有效的做法。在以色列发起针对拉法的地面攻势后,拜登政府开始重审某些近期的对以色列的安全援助,考虑到其用于拉法战事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及其舆论影响,拜登政府于2024年5月停止向以色列运送用于空袭的1800枚2000磅和1700枚500磅炸弹。^③

在外交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联合国暂时降低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暂停某些双边对话,显示对以色列拒不听从美国劝阻和警告的不满。否决以色列政府反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一直是美国联合国外交通行的做法。2024年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停火的2728号决议(U. 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28)进行表决,美国代表投了弃权票,在此前3次——2023年10月18日、2023年12月8日、2024年2月20日——有关加沙停火的安理会决议表决中,美国代表均动用了否决权。^④ 在拜登政府于2024年5月暂停向以色列交付用于空袭的炸弹后,内塔尼亚胡于6月公开声称,拜登政府“扣押武器”,为武器供给制造“瓶颈”,拜登政府随即取消“美以战略磋商组”原定于2024年6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加沙战事和中东局势的美以战略对话,以示对以色列的不满和警告。^⑤

①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7.

② Jeremy M. Sharp, *Israel and Hamas Conflict in Brief: Overview*, pp. 9-10.

③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7.

④ Jeremy Pressman, “Mind the Gap: U. S. Preferences and Israel’s War Conduct,” pp. 17-18.

⑤ Ethan Mayer-Rich, “White House Cancels US-Israel Strategic Dialogue After Netanyahu Criticizes US Administration,”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 C., Jun, 24, 2024,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white-house-cancels-us-israel-strategic-dialogue/>, 2025-08-30.

三、拜登政府对以管束失败的原因分析

既有的联盟管束理论强调,联盟管束是某种尝试或努力,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衡量管束成败的标准则是,如果被管束方不顾管束方反对而继续实施其军事政策,管束则告失败;如果被管束方改变、放弃或替换管束者所反对的军事政策,管束则告成功。管束举措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实力动员(power mobilization),即管束方是否充分调动自己的战略资源,用于对盟国的管束,而实力动员的充分性则主要取决于被管束方军事政策对管束方国家安全或对外战略议事日程的影响。^① 美国—以色列联盟是典型的“非对称联盟”(asymmetric alliance),即综合实力或战略资源相差巨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② 但美以关系的历史显示,当美以因利益冲突而产生政策分歧时,美国的政策主张很难占据上风,如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当美以联盟管理涉及美国管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时,美国管束失败的事例并非罕见。有关美国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既有研究成果显示,美国管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积极、充分地运用其综合实力和调动其战略资源,美国为管束以色列而运用实力和调集资源的充分性、积极性则取决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对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的影响。当以色列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推进或实施时,美国往往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亮起“绿灯”,当以色列军事行动威胁或危害美国对外战略目标时,美国则对此类行动亮起“红灯”,实施管束;管束的力度则取决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威胁或危害的美国对外战略目标在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的优先次序,排序越优先,管束意愿越强烈,美国用于管束的实力运用和资源调集就越充分,管束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反之亦然。^③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

①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5-17.

② Daniel Sobelman, "Restraining an Ally: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s Nuclear Program, 2011-2012,"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1, Issue 4, August 2018, pp. 11-13.

③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4-125.

以色列仍按部就班地实施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由此造成的平民伤亡不断攀升,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重。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是美国一次失败的联盟管束尝试,2024年夏季以后,拜登政府没有就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尝试新的具体举措。拜登政府对以管束失败主要源于管束不力,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管束意志不足,导致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最优先事项的推进。

(一)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管束不力

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管束不力,即拜登政府没有充分运用其实力和调集资源用于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实际运用中,已经启用的管束举措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大打折扣。按拜登总统2024年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20》相关条款要求,拜登政府于2024年5月向国会提交报告。该报告一方面承认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中使用美式装备造成平民伤亡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但又强调,以色列3月提供的书面保证“可信且可靠,因而可以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国家安全备忘录—20》所涉及的防务物件”。^①2024年5月,拜登政府停止向以色列运送用于空袭的1800枚2000磅和1700枚500磅炸弹,但很快又解除对供应1700枚500磅炸弹的审查,并恢复运送。^②在联合国安理会2024年3月25日就加沙停火决议进行的表决中,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投了弃权票,但她随即称,“此决议没有约束力”,从而冲淡了美国以弃权表达对以色列不满的意义。^③鉴于内塔尼亚胡总理有关拜登政府“武器禁运”的言论,拜登政府取消“美以战略磋商组”原定于2024年6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以战略对话,以示对以色列的不满和警告,但仅在两天

^①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 5.

^② *Ibid.*, p. 7.

^③ Jeremy Pressman, “Mind the Gap: U. S. Preferences and Israel’s War Conduct,” p. 18.

后就恢复此次战略对话,大大降低了以外交手段管束以色列的严肃性。^①

其二,拜登政府并未履行美国某些既有的法律,使之成为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有力武器。美以联盟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为以色列防务严重依赖美国安全援助,尤其是在战时,美国源源不断的武器供给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国会通过立法为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援助限定条件,这些法案除规定国会在安全援助中的监督和制约职能外,也为行政当局向盟友提供武器和训练制定规范,其中较为重要,同时也是美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拜登政府履行的法律就是所谓的《莱希法》(Leahy laws)或《莱希修正案》(Leahy amendments),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作为《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修正案的法律条款,强调禁止行政当局向任何外国安全部队提供安全援助,如果证明该部队严重违反人权;二是体现在每一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中的条款,即如果证明某外国安全或警察部队严重违法人权,则禁止国防部资金用于该部队的培训。^②在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后,美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拜登政府依据《莱希法》,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供给,美国国务院负责《莱希法》应用的官员则指出,将《莱希法》应用于以色列加沙战事,根本不在拜登政府考虑之列。^③

(二) 拜登政府管束以色列的意志不足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未能对后者产生制约作用,这主要源于拜登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美国在美以非对称联盟中的战略优势,造成管束不力。此种管束不力主要源自拜登政府缺乏强烈的管束意志,其管束举措多是为应付大选年的国内舆论压力及缓解对“新中东战略”的负面影响而为之,其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政策仍然是以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武装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但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在国内舆论重压

^① Ethan Mayer-Rich, "White House Cancels US-Israel Strategic Dialogue After Netanyahu Criticizes US Administration."

^② Charles O. (Cob) Blaha, "Israel and the Leahy Law," *Just Security*, June 10, 2024, <https://www.justsecurity.org/96522/israel-leahy-law/>.

^③ Jeremy Pressman, "Mind the Gap: U. S. Preferences and Israel's War Conduct," p. 17.

之下,拜登政府为什么仍然坚持支持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相关分析可以从美国对外战略目标及其在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的优先次序为视角,阐释拜登政府缺乏管束意志,从而造成管束不力的原因。

1.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与美国对外战略。拜登政府及更为广泛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主要是从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的视角看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拜登政府及美国战略界认为,一方面,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打击、摧毁以伊朗为首的地区反美网络,有利于美国在实施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为中东战略转型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助于遏制包括伊朗在内的“全球反美轴心”对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有利于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赢取战略优势。在此类认知支配下,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很难有强烈的管束意志。

从美国地区战略看,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和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对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事的政策及其背后的“新中东战略”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其在2024年2—6月着手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重要动因之一。但就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政策而言,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及其在加沙旨在消灭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始终是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而拜登政府推行的“新中东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在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的前提下,实现美国中东战略从“安全第一”到“民生第一”的转型。在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仍然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相当部分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仍强调,只有肃清对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才能提上议事日程,“安全第一”在美国中东战略界仍有较大市场。

在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看来,自美国全面介入中东事务以来,经过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反恐战争,阿以和解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目前仅存的反美反以势力就是伊朗及其代理人,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在以色列开启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后,黎巴嫩真主党随即对以色列宣战,也门胡塞武装也以实际行动展示对哈马斯的支持,而伊朗更是毫不掩饰其哈马斯支持者的角色。在

拜登政府看来,以色列在加沙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就是打击以伊朗为首的中东反美轴心,在以色列以一系列“精准斩首”的战术有效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本土及其在叙利亚的目标后,拜登政府及美国战略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及其有效性,无疑有助于削弱甚至消灭伊朗及其代理人在中东构建的反美轴心,有利于为美国新“中东战略”的推行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①

从美国全球战略看,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以大国竞争为核心,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战略界将这些对手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世界秩序之争,即“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挑战或改变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则竭力维护这种秩序。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削弱竞争对手,赢取战略竞争优势,维持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新一轮大国竞争的扩展和深化,美国战略界认为,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围绕世界秩序之争,国家的阵营化趋势日趋明显,这种趋势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及北约盟国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而中国、伊朗和朝鲜则给予俄罗斯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支持。2023年10月,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美国全球战略——即大国竞争或世界秩序之争——视角看待这场战争,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的同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以各种形式支持哈马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不仅事关巴勒斯坦未来和中东地缘战略格局,而且事关以美国/西方为首的“现状国”与“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之争。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后,拜登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与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的军事行

^① Benjamin Miller, “Israel’s Post-October 7 Wa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28, No.1, March 2025, pp. 10-11.

动相提并论,并强调“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拐点”。^① 在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看来,美国中东战略与其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紧密相关。

拜登总统早在2022年6月出访中东期间就刻意公开强调,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局限于印太和欧洲,中东也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② 在俄乌冲突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界人士重点研讨竞争对手在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斗争中的合作与协调。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全球“反美轴心”,尽管这一松散的反美同盟并非某种有条约约束的军事同盟,但它们在外交、信息舆论和反制美国制裁等领域相互合作,协调配合。^③ 其中,伊朗的角色尤为引起美国战略界关注。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作为中东反美抵抗轴心的倡导者和全球反美轴心的重要成员,伊朗实际上成为连接中东反美势力与全球反美同盟的结点;打击和摧毁哈马斯,就是削弱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削弱伊朗一定程度上就是侵蚀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反美轴心”。在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日益呈现且同时在与真主党、胡塞武装甚至伊朗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上风后,美国战略界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及其延伸——与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以及与伊朗的交锋,不仅有助于打击、摧毁伊朗在中东的反美网络,且有助于削弱伊朗本身,从而有助于遏制全球“反美轴心”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赢取竞争优势。^④

2. 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动因和管束意志不足,都可以从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加以解释。一方面,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对拜登政府应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Hamas’s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and Russia’s Ongoing Brutal War Against Ukraine,” October 20,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0/20/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united-states-response-to-hamas-terrorist-attacks-against-israel-and-russias-ongoing-brutal-war-against-ukraine/>, 2025-08-30.

^②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East Partners to Address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③ Daniel Byman and Seth G. Jones, “Legion of Doom?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Survival*, Vol.66, No.4, August-September 2024, pp. 29-50.

^④ Benjamin Miller, “Israel’s Post-October 7 Wa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p. 11-12.

对加沙战争的其他政策要素及其背后的“新中东战略”造成负面影响,促使拜登政府着手管制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打击、削弱中东以伊朗为首的反美抵抗网络,有利于美国以遏制竞争对手、赢取战略优势为核心的大国竞争战略,从而削弱了拜登政府的管束意志。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同时不利于或有利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某些目标,关键在于这些目标在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的优先次序。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对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除支持以色列“自卫权”以外的其他政策要素,如确保人质释放;防止战争升级、扩大;有效应对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着手战后重建等,造成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也对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新中东战略”中的某些目标,如实现美国中东战略从“安全第一”到“民生第一”的转型,制造障碍。“新中东战略”强调“地区整合”“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等要素,但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有关“新中东战略”的文献始终强调,美国中东战略转型的前提是,在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由地区盟友或伙伴有效应对以伊朗为首的中东反美抵抗网络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威胁。^①因此,“新中东战略”的相关表述仍然将“维护地区安全”放在首位,只不过是在美军不直接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由地区盟友或伙伴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实现,而“地区整合”“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则是在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的次要目标。“安全第一”是美国“新中东战略”的现实需求,而“民生第一”则是某种战略愿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增进美国“新中东战略”的首要目标,且符合美国战略界有关在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背景下,由盟友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的战略构想;相对于打击、消灭中东反美抵抗网络,“人道主义”和“民生”在美国“新中东战略”中仍居于次要地位。鉴于加沙复杂的作战环境,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与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和“民生福利”存在一定矛盾,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有助于实现美国新中东战略的安全要素,而这一

^① Dalia Dassa Kaye, et al., *Reimagining U. 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Sustainable Partnerships, Strategic Investments*,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21, pp. 1-5.

安全要素在该战略中居于首要地位,拜登政府很难有强烈的意愿实施有损于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效性的管制举措。

美国在新的国际竞争时代的全球战略以维持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为主要目标,强调以增进美国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实力和影响力为路径,赢取竞争优势。拜登政府强调以民主价值观外交增进美国全球影响力,强调民主、人权、民生等价值观在美国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另外,拜登政府仍然将实力地位放在国际竞争战略中的首要地位,追求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的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的联盟体系,除强化美国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化,拜登政府致力于遏制对手结盟的倾向,削弱、瓦解对手的阵营。^① 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助于打击“全球反美轴心”的重要成员伊朗,从而有助于遏制该“轴心”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因而有利于美国以国际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但是,如果拜登政府不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施以有效管束,加沙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将有损于拜登政府的民主价值观外交,有损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相对于以己方的“实力倍增器”压制竞争对手的“阵营化”,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更倾向于将民主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外战略议事日程的次要地位,尤其是随着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日趋显著,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人士利用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推进美国国际竞争战略的意愿日趋强烈,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意志则不断弱化。

结 语

本文以联盟管束的既有成果为基础,考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在加沙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持无条件支持态度,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促发美国国内抗议运动并对拜登政府应对加沙战争的其他政策要素及其背后的“新中东战略”造成负面影响,促使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施以言辞和具体管束,但这些管束举措并未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产

^① Benjamin Miller, “Israel’s Post-October 7 Wa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p. 3-5.

生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拜登政府并未充分运用美国的战略资源,管束不力,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在美国中东战略和全球战略议事日程中更具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的推进。从2024年7月开始直至拜登政府卸任,美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逐渐势弱。

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美国强化了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支持。^① 特朗普总统宣布解除拜登政府于2024年5月开始实施的停止向以色列运送用于空袭的1800枚2000磅炸弹的决定,并废除拜登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20》。^② 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及以色列针对以伊朗为首的“反美轴心”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的有效性日益凸显,加之特朗普总统本人强烈的亲以立场,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并未成为“特朗普2.0”处理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政策选项,“特朗普2.0”不仅参与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且在加沙停火协议谈判中支持以色列在解除哈马斯武装、加沙行政管理及加沙战后重建等问题上的立场。本文的解释视角,即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中东战略和全球战略中居优先地位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特朗普2.0”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缺失和支持、纵容。

本文主要从美国的视角考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及其失败原因,没有将联盟管束视为管束方与被管束方的某种带有战略博弈性质的互动进程,即没有考虑以色列对管制举措的抵制也有可能影响管束效果,因此,以战略博弈视角考察联盟管束,是联盟管束理论和政策研究有待探索的路径。

^① Jeremy M. Sharp,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pp. 10-11.

^② Ibid.

2025年11月22—23日,第十八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世界政治中的人、国家与组织”。论坛共收到来自国内外50所高校博士生所提交的论文190余篇。经论坛学术委员会匿名评阅,共有来自20所高校的35篇论文入选。经论坛学术委员会最终投票,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4名。

第十八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 博士生学术论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张水北(清华大学):《超越发展型国家:卢旺达政府在旅游业的选择性嵌入》

二等奖

朱翊民(北京大学):《行动合法化、职能拓展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差异化海外安全供给模式》

吕蕙伊(清华大学):《现实的锚:关键事实与“中国债务陷阱”战略叙事的衰败》

三等奖

宋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美国人工智能革命的文化动因及国家叙事》

陈涵(北京大学):《当代美国新左翼的困境及其根源》

马舒腾(北京大学):《模仿、嫁接与竞争:国际组织间规范扩散机制探析》

王银肖(国防科技大学):《相互依赖的代价?全球供应链压力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动态互动研究》

Alliance Restraint in the US-Israel Allia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Restrain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Gaza

Zhang Fan (134)

Follow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launched by Hamas in 2023, Israel rapidly initiated large-scal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Gaza Strip with the declared objective of eliminating Hamas. The ensuing military campaign led to a rising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a worsening humanitarian crisis. These developments exerted growing pressure on U. S. domestic politics during an election year, adversely affected the Democratic Party's electoral prospects, and undermin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advance its "New Middle East Strategy." From February 2024, to ease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while mitig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n its regional strateg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ought to restrain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Gaza through various U. S. -Israel institution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s, issuing warnings and exerting pressure, while also adopting punitive measures in the areas of arms supply and diplomacy. However, these efforts failed to produce tangible results, as Israel continued its military campaign in Gaz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traint of Israel constitutes a failed attempt at alliance restraint. The failure stems from inadequate enforcement capacity, but more fundamentally, it reflects a lack of genuine political will. In the view of U. S. strategic circles,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 in Gaza serves the advancement of top-priority objectives on the U. S. foreign policy agenda. President Trump, who returned to the White House in January 2025, did not consider constraining Israel's Gaza operations as a policy option for addressing the Gaza crisis. Since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U. S. and Israel on some governance issues in post-conflict Gaza,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Trump 2.0 to apply "alliance restraint" to U. S. policy towards Israel.

Top Paper Winners at the 18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Ph. D. Students (155)

Peer Reviewers for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2025 (156)

2025 Catalog of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7)